

王琦 陈云涛 等著

文化自觉： 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

WENHUA ZIJUE:
GAOZHI JIAOYU KE CHIXU FAZ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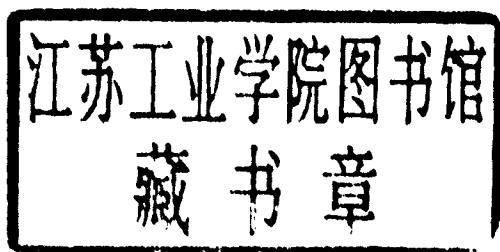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文化自觉：

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

王 琦 陈云涛 等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文化自觉: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

王 琦 陈云涛 等著

责任编辑 李玲如
封面设计 姚燕鸣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 0571—88925592 88273066(传真)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德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75 千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9490-514-7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序

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流方可流长,我们要探求高职教育文化的内涵,就必然要追究高职教育文化的“根”与“源”。那么,这个“根”与“源”在哪里呢?

文化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裹挟着鱼虾、泥沙,汇聚了众多的支流,演为巨川,浩荡东流。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到底如何,已有太多的探讨,最终还是不能形成一个公认的说法。但文化的多元性、综合性却是毋庸置疑的。高职教育文化作为文化母体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身份的追问与确认使我们不得不回望那逝去的灿烂时光。

中华文化的传统是重“道”轻“器”,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礼乐制度,仁义道德,是士大夫们的着眼点与着力点,而实用技术层面则不受重视,处于相对自发的状态。其实这个传统是在中国的封建制度建立以后才慢慢形成的,在我们的先民时代并没有那么多的“形而上”的问题可供探讨,为了生存,他们是勤勤恳恳的实干家,现今还在流传的中华民族初民时代的故事便是很好的证明,燧人氏钻木取火,神农尝百草,嫫祖养蚕制丝,大禹治水,这些传说里无不闪现着先民们奔波不息的身影。东周一分而为春秋战国,中华文化的巨子们陆续登台,诸子缤纷,百家争鸣,作为精神层面的“道”成为人民热

衷的话题,与此同时,技术派亦不甘人后,杰出代表当为中国木匠之祖公输班(鲁班),传说其用竹木制作飞鸟,可以三天不落地,还发明制作了锯子、墨斗、刨子、凿子等木工用具,最著名的当属制造了攻城用的云梯,当他用云梯助楚攻宋时,被另一位技术大师墨子破解,而墨子在技术上的贡献也相当了得,他利用力学、光学、声学、几何学等原理制作了许多器具,还做过著名的“小孔成像”实验。兵荒马乱的春秋战国由于没有定于一尊的思想钳制,成为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而且这些思想大师们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的主张,为自己的主张奔走呼号。自秦始皇建立独裁制度以后,绵延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态只是一再地重负而已,维护统治者既得利益的上层建筑便成为重中之重,“器物”层面的技术类沦为亚文化。亚文化不等于没文化,实用性和操作性的工艺制造类文化依然不绝如缕地传下来,从来就没有断绝过,只是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这种亚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在北宋时期终于出现了,他就是沈括,在他的科技巨著《梦溪笔谈》中,沈括记载了自己一生的科学活动,介绍了毕昇的活字印刷术等宋人发明,记录了宋代的炼钢等技术以及石油的应用。由于沈括在中国科技史上的巨大作用,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为“中国整部科技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梦溪笔谈》也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另一位杰出人物当属明代的宋应星,其所著《天工开物》,寓意“人间巧艺夺天工”,是一本涵盖面很广的农艺学与工艺学综合性科技著作。全书对明代的生产知识、工艺技术作了全面的总结,李约瑟称之为“中国 17 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以上所说似乎跟职业教育相去甚远,但其中的精髓却是相通的,相通在其所论范畴的实用性、技术性与行业性。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从没有明确地提出职业教育的概念,也从没有摆在皇帝的龙桌上认真的研究过,但其精神通过文化的点滴渗透进我们的职业教育理念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职业教育是通过学徒形式来完成的。这种形式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它的核心教育理念还是值得我们坚持和借鉴的,也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内涵。其中,“言传身教”的教育模式尤为重要,这种教育形式培养出的人综合素质较高,富有创造精神;以“耳提面命”为核心的技能传授,受教育者一旦心领神会,便能随心所欲,在生产制作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技法、样式和风格,也使得技艺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生命力;以现场学习为主的教学组织形式,学习者从识别材料、打磨修理工具这些基本工作做起,到能够完全独立地完成一件产品,这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探索、不断摸索的过程,也是一个用心掌握技巧的过程;强调亲密的师徒关系,这种“情感效应”对知识技能的传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我国古代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知”与“行”。到底哪个更重要一些呢?《尚书·说命中》说:“非知之艰,行之维艰。”后来被简化为“知易行难”,知道容易但实践起来很艰难。其实这已经在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了,也说明了行动的困难性,并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只重视读书科考的传统,而忽视技术性人才的实际情况。到了近代,孙中山先生痛感当时实权人物只知道为一己之私利而混战,认识

不到现代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提出了著名的说法:“知难行易。”说明只有具备了很高的现代素养,才能建设真正现代化的国家,强调了认识的重要性。在“知”与“行”的问题上,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以名字进行了有趣的阐释,他起初给自己取名陶知行,也即中山先生的意思,后来认为知从行来,于是改名陶行知,强调了实践对认知的先导性作用。

现在,我们听说的最多的大概是“知行合一”之说,这是明朝王守仁先生提出来的,强调“知”与“行”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补充性,细究起来,这种说法更加富有辩证意味,所以成为大家最为熟悉的一种说法。而这种说法与高职教育的理念也有着更多的契合之处。高职教育强调职业性与应用性,从什么路径来实现这一点呢?当前高职教育正在大力推行的工学交替模式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传统的教育是先读书后做事,读书时强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读到满腹经纶后再出来做事,但往往一身书呆子气,做事则迂腐不通。作为强调职业性与应用性的高职教育,当然要解决单纯的书本教育与实践工作相脱节的问题,工学交替的推行,有助于在进行书本学习与模拟教学的过程中,将理论知识与实训经验运用于社会的实际工作中去,形成很好的互补作用,促进职业精神更好更快地形成。在进行工学交替的过程中,行业与企业文化必然会作用于实习的学生,使他们较早地融入职业文化中去。而随着学生的往返于校园,行业与企业文化又随之进入了校园。如此,第一线的行业文化、企业精神便在第一时间进入了校园,大大缩短了校园与社会的距离。这种精神的

传播由于学生的亲历性而显得异常珍贵,并且很容易成为高职教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单纯靠中国古代的职业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显然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西方在职业教育方面比我们进行得早,已经形成了许多先进的理念和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学习和引进世界先进职业文化的过程。

事实证明,没有发达的现代制造业,就不会形成发达的职业教育。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他们的职业教育形成了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体现出了职业教育的一些普遍性的规律。我们国家大规模地兴办高等职业教育,是在2000年前后,经验的欠缺是自然的。因此,创造各种机会,积极引进、探讨、实验各种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构建等,最终形成自己成熟的职业教育体系,是我们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们应该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职业教育与国外的职业教育存在的差异,我们国情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人口众多,也就是说,我国正在举办的是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我们应彰显更多的中国元素,以培养更多更好的适合中国市场需求职业人才。

在职业教育文化传承与借鉴上,我们应该扩展我们的视野,从祖先的智慧与西方的经验里汲取精华,为我所用,结合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高职教育文化。

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目 录

第一篇 高职教育变革语境中的发展观 / 001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高职教育文化建设 /003

第二章 高职院校文化创新 /019

第三章 文化自觉与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 /032

第二篇 高职教育变革语境中的文化观 / 083

第四章 金融企业文化与优质“银领”培养 /085

第五章 企业文化与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 /096

第六章 质量管理文化与高职会计特色人才培养 /109

第七章 职业文化与高职国贸专业“双元双优”教学
团队建设 /123

第八章 “网商文化”与高职电子商务教育的发展 /134

第九章 浙商文化与经管类人才培养 /152

第三篇 中国现代化语境中的文化育人 / 163

第十章 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提升高职生就业竞争力的
文化心理分析 /165

第十一章 高职学生的精神困境与理想人格的确立 /179

附 录 / 197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真谛:机制创新与文化
引领 / 199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三维文化育人”的探索与实践 / 209

后 记 / 222

第一篇

高职教育变革语境中的发展观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 高职教育文化建设

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有没有自己的文化之根？如果有，我们如何从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发展的力量？是每个职业技术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高职教育强调培养应用型人才，那么，应用型人才是否需要全面发展、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高等职业教育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教育，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人是需要全面发展、均衡发展、持续发展的。这些都离不开全面健康的文化建设。我们的高职文化建设，既应该吸收西方的有益的成分，也应该从祖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一般而言，人们多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只重视形而上的精神层面，不重视具体的实用技术层面。这有相当道理，但并不全面。我们不能因为儒家文化长时间占据了主导地位，就看不到其他方面的文化——好像这些文化不存在，或者好像这些文化就不是我们的传统。其实，我们谈到“文化传统”的时候，应该看到中国存在着“主文化”和“亚文化”两个层面，而这两个层面存在着很多差异。在“主文化”重道轻器的同时，“亚文化”做到了两者并重，在“主文化”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时候，“亚文化”则在民间绵延不绝。我们历史上曾经存在

着重视实用技术的文化,并且很成系统,有很高的水平,值得我们吸收、借鉴,并发扬光大。

我们对儒家文化也不能只看到它“重道轻器”而与重视实用的高职教育龃龉不合的一面,还应该看到儒家文化也存在有益于高职文化建设的因素。我们认为,举凡对今天的高职文化建设有利的传统文化,都应成为我们高职文化建设的精神力量,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那么,这些可以成为我们高职文化建设发展动力的传统文化源泉都包含哪些方面呢?我们的高职文化建设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哪些有益的因素呢?我们认为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儒家:格物致知,经世致用

建设高职文化需要丰富的传统文化的营养,儒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之一,也应该纳入我们的视野。例如儒家提出的“经世致用”、“格物致知”,就有很好的现实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吸收借鉴。

1. 经世致用

儒家由于非常强调“修、齐、治、平”,因此存在过分重视道德伦理的倾向。但儒家并非铁板一块,它也有变化,也强调适应社会需要,如后期儒家就特别强调“经世致用”,这同样是儒家的传统,同样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社会影响。“经世致用”思想产生于社会剧烈变革时期,是儒家思想为适应新的历史需要产生的重大变革。它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

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

我们的高等职业教育就是要培养应用型人才,是强调“致用”的教育,这与后期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有内在的一致性,我们完全可以吸收这样的儒家优良传统,建设我们的高职文化。

“经世致用”思想的开创者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顾炎武思想的核心是“经世致用”和“利国富民”。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空疏学风。顾炎武自青年时期开始,就开始关注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实学”,他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从中辑录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他继承了明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开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

南宋时浙东学派中以吕祖谦为首的金华学派提倡经世致用,主张治经史以致用,反对当时的理学家奢谈心性命理的空疏之学。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把经世致用之学与功利之学结合起来,对理学的

空谈,作了猛烈的批评。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大兴,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代表人物有黄宗羲、王夫之、李贽、颜元等。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教训的基础上,深感明季学风的空疏不实,对国家、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书生徒讲义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他们要求学术反虚就实,提倡经世致用的真学问和“以实为宗”的新学风。他们学风的特点是:务当世之务,康济时艰,反对脱离社会实际;勇于任事,不务空谈,“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致力于创新,绝不蹈袭古人;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他们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社会问题的一切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国家、民族、法律、边疆、地理、人情、风俗、自然科学等等,“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

他们以社会问题为中心,在救世济时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各种方案:①政治上,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揭露封建专制君主的罪恶,并提出了一些带有初步民主启蒙因素的主张,如黄宗羲“公其是非于学校”、顾炎武“庶民干政”的主张。②经济上,针对封建的土地兼并,提出了各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都贯穿着“均田”的精神。他们提出的“均田”虽与农民起义提出的“均田”有根本不同,但表现出对农民问题的关心和同情。③教育上,他们激烈地批判束缚思想的科学制和八股时文,注重学校教育,要求培养出真正有学问有实际能力的有用人才。④哲学上,他们各有所宗,各有所创,呈现出思想活跃的局面。

清末,封建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经世

致用之学,再度兴起。其代表人物是魏源、龚自珍以及稍后的康有为。他们以今文经学为主干,继承和发展了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精神,借经书的所谓“微言大义”发挥自己社会改革的主张。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经世致用”思想中的“经世”的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侧重“形而上”;“致用”的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侧重“形而下”。“经世致用”思想强调把远大理想抱负和锲而不舍的努力结合起来,既要志存高远,敢为天下先,又要脚踏实地,从点滴做起。

我们今天“致用”型高职教育的大发展,与儒家“经世致用”思想有着内在要求上的一致性,而且两者的产生都是基于时代剧烈变革的现实需要,都要有打破原来框框的变革创新的勇气。因此,研究、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用于发展我们的高职文化建设,为我们提供文化的营养和理论的借鉴,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格物致知

与“经世致用”思想相比,“格物致知”的提出时间更早,对我们建设高职文化也具有更直接的借鉴意义。但“格物致知”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历史上的社会精英们也对它存在着不同理解。或许它所引起的歧义和它所经历的坎坷历程,对我们今天的高职文化建设更具启示意义。

“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重要命题之一,语出《礼记·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在宋明理学时代是非常著名的认识论学说。从宋代理学家程颐开始,把格物致知作为认识论的重要问题。程颐认